

SARS 报道和 COVID-19 报道中的媒介呈现和框架变迁

作者：唐皖君

（单位：湖南大学 所在省市：湖南省长沙市 邮编：410000）

摘要：

2002 年 11 月我国广东省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时隔 17 年后，2019 年 12 月我国湖北省发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由于 2002 年至 2003 年间，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呈现出明显的断层期和失语期，导致了公众极大的恐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非典型肺炎从致病的病毒本身来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也直接导致了两者在传染路径和传播方式上的高相似度。但是由于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处在社交媒介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因此对其报道的媒介呈现和报道框架较之以往也存在诸多传播调适，以适应网络时代受众的接收习惯。当下《人民日报》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道，是否依然借鉴了非典型肺炎的媒介呈现方式和报道框架？这些传播调适取得了什么样的传播效果？这对于今后有关于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报道有何启发？

关键词：SARS 报道、COVID-19 报道、媒介呈现、框架变迁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这一媒介对于两次疫情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此次 COVID-19 报道中《人民日报》同时使用了其他新媒介这一情况，本文也选取@人民日报对 COVID-19 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人民日报》创刊于 1948 年 6 月 15 日，直至今日其日发行量高达 320 万份，在传统媒介中高居榜首；而@人民日报创办于 2012 年 7 月 22 日，截止至 2020 年 3 月，其粉丝量高达一亿，在各类传统媒介微博排行榜中高居榜首。

在样本选取上，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在 2003 年 4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21 日间所有关于 SARS（以下简称“非典”肺炎）报道的文本，共 870 篇；《人民日报》在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 日间所有关于 COVID-19 的报道文本，共 1079 篇；以及@人民日报在 2020 年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 日间所有关于 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报道文本，共 630 篇。通过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探讨这其中的媒介呈现和框架变迁。

在类目构建上，主要对样本的报道类型、报道框架、话语来源、报道视角、情感色彩等方面进行统计。其中，报道类型分为事件报道、宣传报道、专题报道和其他四类。事件报道指疫情过程中针对当前的疫情动态、医疗情况、病患追踪等的报道；宣传报道指疫情过程中对政府举措、典型人物、科普宣传等的报道；专题报道指疫情过程中对当前某一现象进行专版或系列报道。报道框架从疫情报道的数量、篇幅、主题、体裁四个方面展开。并将报道主题分为政府举措、疫情动态、医疗捐助、基层抗疫、社区防治、病患追踪、典型人物、国际

声音、科研成果、专家答疑、科普宣传及其他等十二类。话语来源主要依据报道的主要信源来确定，其中一篇文本只计算一次信源。编码过程有两名编码员完成，根据霍斯提公式计算得到编码员间信度为 0.87，符合要求。

一 框架呈现：从传者认知到受者认知

从 2003 年《人民日报》对“非典”报道的主题来看，集中在关于疫情动态的报道为 279 篇，政府举措的报道为 108 篇，社会防治的报道为 73 篇，病患追踪的报道为 69 篇，在全部报道中占比 60.8%；从报道的体裁来看，其中消息 463 篇，通讯 177 篇，总占比 74%；从报道的篇幅来看，其中 300 字以内为 136 篇，300-800 字为 224 篇，800-2500 字为 468 篇。

2019 年《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对”新冠”报道的主题则主要集中为，疫情动态 294 篇，政府举措 399 篇，基层抗疫 176 篇，国际疫情 185 篇，典型人物 118 篇，病患追踪 82 篇，占总计 62.2%；从报道体裁来看，其中消息 705 篇，通讯 316 篇，图片新闻 161 篇，占总计 69.2%；其中 300 字内为 735 篇，300-800 字 242 篇，800-2500 字 413 篇，2500 字以上 54 篇。

相较于“非典”报道，《人民日报》在对“新冠”肺炎进行报道时，无论是其传统媒介还是社交媒介，对于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报道框架呈现，最终取决于媒介本身对于此事件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果。在传统媒介为王的时代，媒介承担了传者的角色，当媒介的疫情报道框架更简单清晰的时候，意味着媒介对于疫情的认知渠道更固定并且认知结果也相对明确。因此相对来说，媒介更希望用一种简洁明了的形式，抚平受众焦躁不安的情绪；当媒介的疫情报道框架更复杂多变的时候，意味着媒介对于疫情的认知渠道更嘈杂并且认知结果更模糊。因此相对而言，媒介更倾向于在报道形式的频繁变换中，令受众在感受到未知的状态中严肃的去应对疫情。

在社交媒介居上的时代，媒介和受众的界限被模糊，因此他们互为彼此的传受者。因此情况会更复杂，更需要审时度势。当媒介的疫情报道框架呈现出简单直接的特征，一方面受众能够直接感受到其背后权力体系带来的权威性，增强其信度；另一方面受众也可能因为其某些新闻要素的缺失，比如无图无真相，而降低信度。而当媒介的报道框架呈现出复杂模糊的特征，一方面受众可能因为其中要素的丰富程度，选择相信该报道；另一方面受众也可能会因为报道所指向的结果不明确，选择相信其他渠道的信息。但以《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对于两次疫情的报道来看，当疫情报道中呈现的信息要素更丰富详实，传播的效果也更好。

简而言之，传统媒介和社交媒介之间在疫情报道呈现中最为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总是试图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给与受众继续负重前行的希望和勇气；而后者总是希望呈现出多样的信息和需求，以帮助受众最大限度的接近真相。这其实是由于，无论是传统媒介的经营者还是从业者所预设的受众，是所有处身于疫情当中的普通人。从媒介和受众的双重角度而言，这种广播式的传播特质，始终在设置单项选择。一方面媒介不能全然筛选出自己心仪的受众，受众的情况总是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受众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并不能主动参与信息的制造。在这种认知前提下，《人民日报》的“非典”报道和“新冠”报道呈现出了一种营造氛围的框架结构特征，在媒介获得的疫情信息基础上做减法，给受众传递

一种全民抗疫的决心和信心；但社交媒介的窄播体系却成全了一种更为便捷和实用的双向选择，媒介可以通过标签和兴趣等要素筛选出自己心仪的受众，并吸引其在此获取信息；受众也可以自行辨别出更符合自己认知需求的媒介来获得信息。在这一认知前提下，社交媒介的使用者和经营者，更希望受众普遍接收到更多关于疫情的信息。将受众的认知需求变成，自行甄别信息并拼凑出自己认知范围下的“真相”。因此@人民日报在“新冠”报道时疫情信息的范围更广、种类更多、主题更明确。

二 形象呈现：从专业主义到煽情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和煽情主义，代表了受众对于新闻的客观性要求和情感性诉求。对于新闻行业来说，无论是新闻专业主义还是煽情主义，其本身反映的仅仅是受众对于新闻的天然需求。作为一种行业守则，撇去执行者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种守则本身并无褒贬色彩。文中使用专业主义和煽情主义，仅用以概括新闻对客观性和情感性的表达偏好。

从《人民日报》对“非典”和“新冠”报道的主题分布来看，2003年1月至2003年12月间，“非典”报道集中于发布疫情的最新动态和相关的政府举措，媒介呈现的形象主体是正面作为的政府部门和权威专业的专家学者。因此可以说，“非典”疫情中媒介的主要呈现在于从新闻传播的权威性原则出发，通过构建权威的政府和专家形象，以消除由于疫情早期政府和媒介的失语状态造成公众的心理恐慌；但在2020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新冠”报道当中，《人民日报》的报道主题集中于政府举措、基层抗疫以及国际疫情，媒介呈现的形象除了积极作为的政府部门，更多的变成了团结抗疫的普通民众。这是基于新闻传播的邻近性原则，与公众建立时间和空间上的共情基础。与此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中，也相应地搭配呈现出一些抗击疫情中的反面典型。这其中《人民日报》多报道对于政府不称职官员的撤免，@人民日报这集中于报道普通公众中的恶劣行径，以期对公众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由此可以看到，“新冠”报道中的媒介呈现，在于构建一个共通的情绪场，在与公众达到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将媒介讯息传播给受众。

“非典”报道所处于网络欠发达的时代，作为官方言论对立面的谣言、传言等的传播渠道，集中呈现为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无论是其传播范围还是传播能力，都无法与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介相比较。公众对于权威的崇拜和遵从来自于单渠道的单向传播，因此即使新闻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本身并不可靠，但由于信息更近的不及时以及反馈渠道的缺失，对于受众来说依旧是第一印象越专业、越权威、越可信。这就很容易成就了传统媒介的呈现中“专业主义”，从一种从业守则泛化为一种传播原则。在面对“非典”这样一次突发的公共事件时，《人民日报》本身作为一家权威的传统媒体被呈现，政府和专家以一种绝对正面的权威面貌被呈现，由于这种形象呈现消弭了公众由于缺席“非典”现场造成的未知和恐惧，关于疫情的信息最大程度被受众转化为讯息所接受。

“新冠”爆发于一个网络飞速发展的社交媒介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幅增加，信息与信息之间的间隔也大大缩小。官方言论的对立面不再只是谣言和传言等迅速传播的信息，而是逐渐变成了受众将其转化为并深信不疑的讯息，和来自其他渠道的丰富信息。对于理性的受众而言，信息接收到转化的过程中，他们拥有足够的自我分辨能力，因此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依然能够发挥最大程度的效用；而对于非理性的受众来说，自我分辨能力的不足、专业知识的缺失，都会导致他们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发生情绪的摇摆。事实上，根据我国人口素质发展的现状来看，除了少数处在专业范畴内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在面对突发的公共安

全事件时，都不可避免的处于这种情绪摇摆当中。社交媒介发展所做的第一件事，正是打开了这类情绪的双向传送通道，而网络恰恰实现了它被及时获取的可能。承认、安抚和共生而不是解决情绪成为疫情报道中终极的传播法则，可以说煽情主义恰恰为专业主义找到了新的生存之道。《人民日报》对于“新冠”的报道，一方面在继续保留专业主义的冰冷形象时受到了来自社交媒介冲击，因此在传播效力上大大减弱；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新冠”报道，在探索传统媒介的生存之道时借鉴了煽情主义特征，因此广泛被受众所接受。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实质上打破了社交媒介时代，受众关起耳朵说自己的话这一现状。受众无法只是个体，被迫和其他个体站在一起组成群体。但这一时期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社交媒介，都必须明白煽情主义在今天的发展都不应该只是宣泄、共鸣和放大情绪，而是应该呼吁理解情绪，进而消解负面情绪。在疫情报道当中，媒介所呈现的形象除了从专业引导到情感引导的介入模式之外，还应当跳出媒介的他者身份，和受众站在一起，最终呈现出“无他”的形象。

三 话语呈现：从权力话语到话语权力

福柯借助话语理论阐明话语与权力的同一性关系，话语作为一种借助符号来表达关于某类话题、议题或者问题的陈述。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话语扮演着人类社会中结构与情境塑造者的角色。一方面话语作为一种语言使用中的特殊陈述，隐藏在复杂的权力关系背后，帮助权力的建构和维护；另一方面由话语所组建的特殊情境既赋予事务以社会性，又通过社会性的规则重新分配权力。因此，话语的中心即是权力的中心。

从《人民日报》在“非典”报道中的话语来源来看，媒介的话语来源主要是政府和专家。一方面在于，首次面对传染强度和传播范围都如此巨大的疫情，一线采访的难度相对更大；另一方面在于，对于疫情的最新动态以及应对方案，政府和专家所知的信息比公众更详细和权威。因而无论是从传播价值还是传播能力而言，来自官方的话语明显大幅多于民间。此外，从新闻的议程设置来看，《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其党媒的身份决定了其“非典”报道中的话语结构、框架以及形态，均由党和政府把关。因此公众的话语缺失，实质上来自于权力的介入。这也就解释了2002年11月至2003年4月间媒体的集体性失语状态的发生，在官方、媒介和公众这三方共同出席的舆论场中，权力的介入使得仅有官方的话语被呈现。同时，这种仅剩的且被传播的官方话语又反向加固了权力本身。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应对“非典”疫情时的全民恐慌，实质上反映的是权力结构内部的恐慌。

无论是《人民日报》还是@人民日报在针对“新冠”报道时，明显通过丰富话语来源来消解了这种恐慌，尽管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更为可怕和致命。“新冠”报道中媒介的话语来源集中于政府、公众、医护人员以及国际社会，声音的多重性使得受众得到的信息更丰富，受众一方面能够通过社交平台中的反馈和互动实现第一重议程设置；另一方面又得以在自我筛选的过程中为自己进行第二重议程设置。当然这既得益于网络所带来的便利性，使得采访的手段和工具增加；也得益于社交媒体对于传播渠道的开放，使得来自民间的话语被广泛传播。同时，由于“新冠”病毒的特殊性以及研究的复杂性，来自专家的话语在报道中较之于“非典”报道时期大幅减少。这是因为社交媒介的出现，将专家分化为不同的类型，较之于以往代表官方话语才得以发声的官方专家，今天的专家们借助自己的社交媒介账号及时发声来把自己拉回民间。尽管在这种政府、媒介和公众集体出席的舆论场当中，传播通道中的噪点可能更多，管理的难度也成倍增大。但正是由于噪点的存在，官方权力所支撑的话语份量才得以加重。社交媒介的存在维持了这种良好的多足鼎立关系，令官方的权力时刻处于被监督之

下，也分摊了官方所承担的压力。因为官方与媒介都不必时刻在场，公众通过集体的话语表达诉求也行使监督。

从权力的话语到话语的权力，实质上反映的是从传统媒介到社交媒介的发展过程中，话语背后的权力分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类报道的特殊之处在于时刻明确对立面，在疫情发生的时刻，官方与公众的对立面都是病毒。权力的主客体不再是官方和民众，而是健康和疾病。社交媒介这把钥匙打开了话语背后权力分配的锁，尽管这也许并不适用于其他时期，但从媒介本身来说，关注社会当中的声音并让其进行语言陈述，依然是媒介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之一。

四 结语

媒介对于突发公共安全类事件的报道呈现，最终代表的是该媒介在所属时代中的成长轨迹。《人民日报》作为最典型的传统媒介之一，其所参与报道的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不断将其自身的角色从政府喉舌拉回到媒介本身。在传统媒介寻求转型的今天，无论是哪一种传播调适都只能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其最终依然是为了平衡受众对于这双重角色的心理认同。正如疫情报道所揭示的那样，媒介首先必须要建构一个共情的舆论场，然后加入权力结构、媒介以及公众，最后媒介必须保持呈现三者的发声，并明确交流的目的是为了理解而不是告知。

参考文献：

- [1] 龙强 李艳红. 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 [J]. 国际新闻界, 2017 (2): 52-65

Media presentation and framework change in REPORTING on SARS and COVID-19

Wanjun T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

The first case of atypical pneumonia was found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November 2002. The first case of COVID-19 was found in Hubei Province in December 2019 after a 17-year absence. Due to the reports of SARS in 2002-2003, which showed obvious fault stage and aphasia period, it caused great panic among the public. Covid-19 and SARS share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terms of the virus itself that causes the disease,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the route and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the two diseases. But with this outbreak of COVID-19, we are in the Internet age of highly developed social media.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media presentation and reporting

framework, there are many communication adjustments to adapt to the receiving habits 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twork era. Does the current People's Daily report on COVID-19 still refer to the media presentation mode and reporting framework of SARS? What kind of communication effects have these communication adaptations achieved?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ports on public security emergencies?

Keywords: SARS report, COVID-19 report, media presentation, framework change

作者简介: 唐皖君, 女, 现就读于湖南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研究生二年级。平时喜欢关注当下的新闻传播现象, 并希望通过这些现象找到背后的传播规律。